

共产主义者

◀ 月刊第11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6.03

THE INTERNATIONAL
时事评析

美伊新的冲突
揭示了什么

革命理论

中国内地工会发展现状及
工人组织形态探讨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
谁

官方网站：
bolshhevikleninists.com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美伊新的冲突揭示了什么? 05

II freedom.gov: 意识形态管辖的”长臂猿” 10

13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再论党员和民主集中制 III

17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政治报该向何处去? IV

22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一些建议 V

25 中国内地工会发展现状及工人组织形态探讨 VI

34 中国特务机关的常用手段与我们的对抗策略 VII

40 从“七五”事件看新疆族群矛盾问题 VIII

理论

美伊新的冲突揭示了什么？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波斯湾。截止目前，美海军超过三分之一的兵力和装备都被部署到了针对伊朗的打击阵位中。空军方面，美军已调配了 108 架加油机以及架次难以计数的运输机，调动了总空军力量的百分之四十。美联社声称：“伊朗现在得出结论，他们结束这场战争循环的唯一途径就是流血，并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重大伤害，即使这会让他们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伊朗境内也出现了诸多绝非巧合的“事故”：德黑兰省帕兰德斯市不同地区发生多起爆炸和起火，该市部分地区还出现停电；同一地区被拍摄到疑似地下军事设施的地表通风井起火；位于伊朗西部霍拉马巴德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伊玛目阿里基地发生爆炸。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迫在眉睫。国际层面，德国、日本宣布其公民必须立即撤离伊朗，位于阿联酋沙迦国际机场的两架隶属于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伊尔 - 76TD 现已起飞向东南方向飞越阿拉伯海。主流媒体和军情分析都预测，美国在短期内极有可能对伊朗开战。

选票到手，“和平”滚蛋

在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出于转移国内注意力的目的——让人们暂时忘掉、停止追究移民执法局的暴行和爱泼斯坦档案提及者的犯罪行为——白宫的草台班子决定让伊朗成为下一位受害者。他们尝试用海量的宣传压制舆论，让群众保持金鱼的记忆，而我们有必要引用此前特朗普竞选期间为博得支持作出的“承诺”：

“在美国，我们不试图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而是让它作为榜样闪耀，供所有人观摩。”



和平的“爱好者”与破坏者

今日，为了正当化军事入侵，特朗普的喇叭们又鼓吹因为伊斯兰政权的罪恶，美利坚有责任“解放伊朗”了。此前特朗普还厚颜无耻地将自己塑造为爱兵如子的领袖，谴责民主党对外干涉的行为：

“我不是说军队爱我，是士兵们爱我。五角大楼高层可能不爱我，因为他们只想打仗，好让那些制造炸弹、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优秀公司保持满意。”

民粹煽动家就是这样利用广泛存在的针对现有建制的愤怒情绪，将真实矛盾模糊化，一面“谴责”资本主义，另面利用这个包装自己和其他那些“坏资本家”是不同的。喜欢吹大话的他同样说过：

“我们将通过实力恢复和平……我是几十年来唯一一个没有发动战争的总统。”

可见，天下乌鸦一般黑！无论用什么方法修改“战争”的定义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当今统治白宫的草台班子，闹出的丑闻早就曾出不穷。他们从未希望让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支持自己，美国政治的极化已经成了各政党将自己的“基本盘”推向癫狂，而对摇摆者放弃争取的局面。我们也不要忘记，俄乌前线的屠杀仍在进行时，

曾经的特朗普是如何自夸的：

“我会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只需要 24 小时。”

为什么统治者永远都不可避免的在掌握权力后，背弃曾经的承诺呢？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如此说：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一旦选票到手，白宫的官僚们就会立刻回到那套“在后台进行的真实政治”中去。对统治阶级而言，承诺是用来愚弄老百姓的华丽外衣，而背弃承诺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特朗普竞选时“务实”、不浪费金钱于战争的承诺已然泡汤，这个转变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破产的最好例子：

如果我们只是几年选举一个必然会背弃承诺的所谓“代表”，“替代”群众决策，那诞生的“民主中国”无非就是习近平治下的波拿巴体制套上了一个更好看的外衣。宣传自由平等的所谓“自由派”，也很清楚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避免这种背叛。只有普罗大众亲自掌握属于自己的政权，“民主”才存在保证，但这时候曾经鼓吹“人民第一”的他们又要指责草民们不配执政了。

“自由灯塔”的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为什么中国一场真正的革命，只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迟来的打击

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政权陷入大规模内乱、统治合法性摇摇欲坠时，外部哪怕是象征性的、零星的军事行动——比如对关键通讯节点或象征性权力建筑的几轮轰炸——都极易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锁反应。这种打击可以释放一种政治信号，瓦解摇摆者的信心，诱发统治集团内部的雪崩。

然而，现在的美国狂躁地试图挑起战争，却已经反应迟缓。伊朗国内局势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因为缺乏一个革命性的领导层、巴列维本人不作为的立场和军警残暴的镇压，伊朗新一轮抗议已经被扑灭。政权通过铁腕手段重新稳固了基层动员能力后，美国再试图通过军事打击来进行政治颠覆，几乎无济于事。

所以更大程度上，这场军事行动将会如同以往一样，是针对伊朗核实验的打击。“解放伊朗”的口号是毫无疑问在除了特朗普的无脑支持群体之外，都很清楚是遮掩真实帝国主义利益的遮羞布，所以它对美方缺乏正当性的同时，更可能会成为伊朗政权转嫁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绝佳借口，让原本离心的群众在“反侵略”的旗号下重新集结。



伊朗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

它也完全失去了突袭的可能性，很难复制马杜罗一事的快截了当。在对方防御体系已经处于高度戒备时，零星的轰炸已不足以令其屈服，反而会诱发对方进行歇斯底里的对等报复，从而将局势强行推向美国并无准备、也无意愿承担的全面战争。

错过窗口期的干预，让特朗普计划里的“精准爆破”只会成为“盲目纵火”。这种错过入场时机后的恼羞成怒，非但无法重塑中东的所谓“民主秩序”，反而会因为缺乏定力的军事冒险引发一系列无法预测的地缘连锁反应。

出路何在

毋庸置疑，对美国和伊朗的普通人来说，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负这都是一个“败局”。死亡的将是普通人，获利者安坐在庄园和别墅里坐享其成，等奴隶完成目标后，给他们颁发表演性的奖章，说“你们的牺牲是必要的”。

事实上，和中国民间右翼、民族主义趋势一样，最好治疗爱国主义的、打击这种无脑的战争狂热的，就是战争本身。一切对战争的追崇都将在假肢的碰撞声、母亲的哭泣声和日夜的劳累后被抛弃。我们说：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毫无意义。

共产主义者必须在如此危难的局势下，将反战宣传视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揭穿战争的本质，对伊朗——伊朗的解放只能是伊朗人民自己的事情，伊朗人民唯一的同胞，是国际无产阶级，而不是和伊朗政权敌对的、同样腐败的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对台湾——是否“统一”应该是两岸人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中南海拿出的所谓“历史证据”还是台北为外交利益塑造的谎言。

无数生命又将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迫性不容多说。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提供共产主义革命的替代方案！

(责编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II

freedom.gov: 意识形态管辖的“长臂猿”

作者：新宇



与其说处理问题——对在明尼阿波利斯屠杀无辜民众的执法人员进行追究、公布爱泼斯坦岛相关人士的参与细节——面对愈发尖锐的国内矛盾，白宫选择搞出新的噱头转移注意力。近日美国政府推出了所谓“freedom.gov”网站，允许欧洲用户查看包括所谓的“仇恨言论”和“恐怖主义内容”在内的被屏蔽内容，该网站由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管理。

在搭建尚未完成前，白宫已经按耐不住用重复的几帧动画大肆炒作。能将这种拙劣的政治宣传奉为真理的，除了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民粹基本盘，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自由派”们了。我们暂且不谈这些人如何异想天开，将一个国际互联网上（同样被中国防火长城阻隔的）的网站吹捧为“推倒防火长城的利器”；也不笑话他们意识不到哪怕中国群众真的看到了自己的“自由言论”——也只会感叹政府说的有道理，外网这帮民运和“殖子”的智商实属堪忧——就单谈一切观点成立的前提：因为网站链接里面有自由、发布者声称捍卫自由，它就真的能保卫言论自由吗？

这位几年前鼓动选民喝消毒水预防新冠的大统领幻想，开发这个网站可以将美国描绘成捍卫“知识就是力量”的卫士，而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敌对特朗普当局的欧洲国

家在审查互联网。各国统治阶级之间因地缘政治利益纠纷而起、拿意识形态为幌子的认知战中，通常都抓住他人的小辫子大肆炒作。但这里找错了辫子，言论自由上，当今各国政府可以说抓一个一个不吱声。在言论自由上，美国的此等行为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例如，在特朗普的副手 JD·万斯相关的政治梗图中，美国执法机构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当这些梗图触及了统治集团的政治自尊心或被定性为“误导选民”时，创作者面临的不再是网络禁言，而是 FBI 的敲门声和联邦起诉书。



在特朗普的副手 JD·万斯相关的政治梗图中，美国执法机构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共产主义者清楚，当资产阶级感到政权稳固时，他们允许你对其“口诛笔伐”；一旦这些文字（梗图）开始解构其领袖的权威或动摇其基本盘的信念，法律就会瞬间变脸。“自由”是有条件的！

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互联网上的“政治私刑”？查理柯克被刺杀后，为不幸之事发生于可憎之人感到高兴、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发布自己的观点的人，也遭遇了来自美国民间右翼的系统性开盒。这不是简单的网民互骂，而是利用非法获得的个人信息对异见者进行“社会性处决”。通过开盒，他们剥夺了对方的职业生涯和人身安全。当美国政府声称要在欧洲“解救”那些被屏蔽的仇恨言论时，它在国内正默许甚至推动对异见者进行肉体层面的精准打击。

美国政府对此逻辑的运用堪称厚颜无耻：在国内，任何动摇特朗普统治基础的梗图和言论，都是必须铲除的“恐怖主义”或“虚假信息”；在海外，任何能撕裂欧洲社会、传播极右翼仇恨的言论，都是必须保护的“自由火种”。

为了确保美国定义的“真理”（即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叙事）能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流通，特朗普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唯一的“自由灯塔”，在国际舆论场上确立一种绝对的道德高地。美国政府支持这些内容的输出，是为了在欧洲制造混乱，从而维持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和“自由民

主”的意识形态幌子毫无关系。

“长臂猿”的手管的越宽，就越暴露出它身后那个躯体的虚弱与狰狞。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III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再论党员和民主集中制

作者：向亦秋



前言

在上一系列反击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后文统称为“马列毛大群”或“大群”）的文章发布后，《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的鼓励，也有更多的革命者加入了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事实证明，无论马列毛大群自称多么地爱护“革命新芽”，其向年轻的革命者们所展示的只不过是丢失的严肃性、诈骗式的“地下红军”路线和与警察不清不白的关系，而许多新一代的革命者已然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我们当然明白单纯将无可辩驳的现实端给这些攻击者是不会让他们住口的。就像寄生在人体中的病菌一样，马列毛大群需要从一切正在推进革命事业之组织中获得养分，持续他们那以骂战、不实攻击和聊天吹水组成的“革命”生活。

大群的这些写手们也从来都不避讳这一点，在我们指出他们同那些宣称“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之人一样后，其大言不惭地承认了：“他们以为我们把他们打垮了以后，就不会继续写文章揭露批判他们了吗？当然要狠批，痛批，把他们的反动黑路线彻底的鞭尸，彻底的批倒批臭！”（佚名《干钧棒——紧追穷寇——共格阵的“民

主”包袱始终是放不下》)。

就如同马列毛大群的大部分攻击那样，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打垮了”的结论是如何被单方面提出的，但共革阵的同志们实际上都很感动。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共革阵的党组织在亲临骑手的罢工示威时、在中国各地区的工厂奔走调研时、在实际地为即将到来的台海战争做出横跨两岸多地的联络工作时，马列毛大群依然还在写着那些质量如一的小短文，反复地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无能和怯懦。这不仅代表着我们判断的准确，还说明了我们在这些山头主义者的脑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惧，使他们无时无刻地声称要对我们做神圣的围剿，企图让革命的潮流慢下来、退回去。

再论党员和民主集中制

在盯着《马列毛大群的百篇骂战：歇斯底里与霸权狂热》长达3个月后，大群的写手们终于从无数零散的批判中挤出了几个成形的字：说在讨论对党员的标准时我们没有提及政治标准，这就是在纵容机会主义者的存在！他们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党员的标准第一标准一定是政治标准，即是不是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是不是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并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把是不是参加工作放在政治标准之上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这是资产阶级的业务挂帅，用业务挂帅来衡量标准共革阵里面能不能是机会主义泛滥嘛？共革阵能不能是机会主义组织嘛？”（佚名《干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兜售机会主义的商贩》）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大群的这些写手们学会阅读，在上次的回击文中我们特意标上了引文的出处好让这些只会断章取义的互联网左派自己去看看《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这篇文章。但很明显的是，他们还是没有在疯狂的关键词猎巫女中学会阅读，指责我们没有解释这、没有解释那，必须让我们手把手地领着才肯看些东西。就让我们看看他们所批判的没有对政治标准的要求到底是否属实，以下是我们文章的原文：

“随着人数的增加，入党的标准和程序必须适当地抬高，革命组织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俱乐部，革命组织是进行着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家家游戏，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组织的统一协调的难度也随之上升，因此对于党员个人素质的要求必须要提高，申请人不仅需要经过考察，认同党的纲领，并且必须要具有“党性”，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们先前分析过我们文章的许多部分在马列毛大群的攻击中奇迹般地“蒸发”了，比如“认同党的纲领”、“党性”和“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这些明确的对政治标准的要求正好好地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引文中。实际上，甚至在他们引用以批判的“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这一句都能看出我们对政治标准的理解和要求。政治标准不该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实际的工作和实践所被检验的。要检验政治素养，不是通过看一位党员能把“马列毛大群永远伟大正确”喊得多么响亮、把“地下红军”那套八股文背诵的多

么熟练，而是是否能在中央或基层的理论工作、群众工作中完成高效高质量的产出与成果。可见我们提出的认同党纲的政治思想加上对实际行动的明确要求就是马列毛大群臆断共革阵成员所缺失的“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并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

就此我们希望做出一个倡议：请马列毛大群那些只会抓关键词的批评家们学会从头到尾地阅读理论，如果一天几千字的阅读量太大了分几天看完也可以，不要勉强。

马列毛大群对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之攻击则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如果说对党员和政治标准问题的攻击是其没有读完我们的文章所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更加纯粹的演绎：“这里共革阵表现出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抽象的理解，正因为他们对于民主集中制度理解是抽象的所以他们实行的也是十分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共革阵做贼心虚害怕别人戳破他们专制的本质于是乎披上了一个叫“政治局”的红皮，认为什么事情只要是通过所谓的充分讨论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避免自己被攻击为专制主义，于是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泛民主”。

首先，其攻击共革阵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是“抽象的”，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代表大会和支部等一系列详尽的组织建制与程序不过是“抽象的民主集中制”。那这位写手给出的具体的、切实的、明确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呢？其写道：“只有抓住问题本质并且通过民主集中制度把正确意见广泛讨论推广开来，就能使其他同志也掌握正确的意见并且把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实行下去，这就是我们书上一直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的，相比于具体的实行原则，这种“抓住问题本质”、“把正确意见广泛讨论推广开来”再“实行下去”的空话真的非常“不抽象”。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反复提到了党的一切策略不是该单纯的“要办什么？”，比如说要发展到全国、要比资产阶级的影响力更强之类的话。更加重要的实际上是“怎么办？”，这是列宁在百年前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的文章在反复地回答的。

其次，我们应该无需证明“我是人，马克思是人，所以我是马克思”这种逻辑到底有多荒谬了。在马列毛大群的精神世界里，共革阵会搞“泛民主”竟然是因为共革阵搞“专制”导致的“做贼心虚”，所以共革阵越“专制”，就会越“心虚”，然后就会更“泛民主”。就算我们抛开这个可笑的推导，这其中还透露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有个显著的区别—前者不需要顾及现实。

我们不禁想问，共革阵那所谓“专制的本质”是如何得出的？共革阵走向了“泛民主”又是怎么评估的？我们想告诉这些落字不经过思考的写手们，如果你们不看自己引用的《共产主义者》原文、随心所欲地抛出自己现编的什么“铁证”、最后以八股文的形式把细碎的攻击组装成文，那你们所产出就不是政治批判，而是低俗小说。由此可见，基于现实地写作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素养，而非马列毛大群的。

最后，其还着重批评了我们对于充分讨论的要求。一位写手指责到：“不管最后的结论有多么离谱，只要谁风大，就要听取谁的意见。哪怕是机会主义的意见，就算没有获得多数同意，他们也会尊重。”这段引文把大群对民主集中制的狭隘理解展现的淋漓尽致。就如同民主不是“一人一票选总统”，充分讨论也不是听“谁风大”，

而是要在每位正式成员都有发言权、决策权的大前提下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来。我们理解为什么大群会如此脸谱化地认知充分讨论的意义：就像是没了解过历史的自由派一听到共产主义就只会理解为当代的朝鲜和中国一样，没实际执行过成规模的工作的组织自然不会理解充分讨论对于党内各规划、信息同步和重要问题辩论的重要性。

另一位写手还附和道：“所谓的充分讨论丝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可以让机会主义者大展拳脚，机会主义先生们只需说全体讨论，并在这其中的掺和一两脚，引导一番，就可以把正确的革命的意见揣在一旁，顺势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了。”（佚名《干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假革命真投机》）

按照大群的逻辑，因为组织内会混入机会主义者，所以必须让少部分自觉的成员统领一切，不然要是放开讨论就会让机会主义者夺权。那我们想询问这些组织建设的空想家们，如果不通过充分讨论，一个组织又该如何决定这个少部分的自觉者呢？一个人拥有革命自觉又是怎么得到判断的？就像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马列毛大群口中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怪异就是因为其一直扎根于一个假定：虽然机会主义者会伪装进入组织内部，但革命的自觉性是能一眼被识出的。

事实上，机会主义者在混入革命组织后大可以将自己包装为自觉者，但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对政治素养的高要求将一步步地筛除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存在。这种过滤就是民主集中制中充分讨论的主要功能之一，其依据的是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展示的政治素养，而非对八股文的背诵能力。反之，若是不存在充分的讨论，机会主义者就能通过资历、关系和对八股文的灵活运用而爬上高位。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IV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政治报该向何处去？

作者：向亦秋



中央机关报的基本需求与功能

我们先来看看马列毛大群是如何批判我们对政治报路线的理解的：

“共革阵对政治报路线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就像是套用 AI 后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边承认政治报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革命家组织，一边又开始乱说需要有组织力量来发行政治报，否认政治报的建党作用，甚至还荒谬的抛出，通过政治报将其他手工业小组联合到一起发展成统一的组织。空谈什么没有脚手架和次木料的奇怪比喻，幻想着组织建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究竟是先建设各地区自己的党支部，还是通过政治报路线发展组织力量到能够以全国一盘棋战略进行全国的融工”（佚名《干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的是如何在路线上制造分歧》）。

第一，其指责我们“乱说需要有组织力量来发行政治报”，侧面再一次佐证了为什么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在马列毛大群的空想中，政治报的写作、审核、发行和传播是不需要编辑部、线下工作小组等组织力量的，而凡是尝试靠组织化手段来发行政治报的都忤逆了大群提出的机械建党论。关于政治报的写作和编辑，大群的空

想家们也许忘记了一个事情，一切工作是需要“人”而不是光合作用来完成的，而参与到政治报核心工作的必须是组织成员且需要被明确、高效的政治工作程序与架构组织起来，这一原则是无可置疑的。任何一个希望发行政治报的集体（此处为了照顾大群的敏感神经我们可以先不使用组织这个词）都必须能够回答并解决以下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章？我们的文章该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主题的文章该有哪几位同志负责？这篇文章的修订进度如何了？我们的文章产出该如何促进对集体的教育？共革阵的答案是：让我们充分发挥政治报对集体的组织作用，并以围绕政治报建立起来的组织力量扩大我们的产出、加强对内教育和正式化我们的程序与制度。

同时，我们必须重视起政治报的传播路径，中国的这些所谓“革命组织”并未意识到一个迫切的问题：当下在墙外网络空间（Telegram、X、组织网站）中发布的数百个政治刊物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并不能等同于1900年代那些能在线下印刷、传播的政治报。与《火星报》等政治刊物相比，在外网或加密平台发布文章不会自动地、成规模地流入工厂车间和学校，来自这些场所的声音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反馈给当今的左派们，以供我们了解广大无产阶级的诉求与需要。

这一点正是被这些所谓的政治报组织所忽略的：列宁提出的政治报路线的考核标准是该机关报是否能“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并“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而不是外网平台粉丝数和八股文的产出数量（弗·列宁《怎么办？》）。因此为了“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我们的报纸就必须利用学社和工人小组等组织手段进行线下的传播。如果我们还认为政治报只需要在靠VPN才能访问的网络空间中存在，那这些政治刊物将一直写不出广大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内容，也传达不到无产阶级手中，更承担不了对组织内外思想的统一、对革命者的培养和对各地区分散小组的组织。一言以蔽之，如果要动员起无产阶级或者建立一个带有群众性的革命党，我们要让群众接触、阅读并吸收的就该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第二，我们想再次强调，建议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多做些阅读和学习，少修炼些望文生义的谬误思想。何为望文生义的谬误思想？这当然不是指这些写手们有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只会靠捏造式的解读来进行政治攻击。比如说其写下的共革阵“否认政治报的建党作用”就是一个经典的从不知何处出现的指控：明明在其引用的部分中我们说明了“政治报是联系分散地区、统一思想方向、培育组织骨干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切共产主义革命者都认同的基本纲领”，大群的攻击者还能够自顾自地写着和事实完全不符的骂战文，这种勇气和自信实在是令人敬佩。这使我们想到了列宁曾对攻击者做出的比喻：“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愿正视现实”（弗·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由此可见，大群对引文的选用也不过是形式上的伪装，毕竟这些写手们能用我们对政治报路线的强调批判我们反对政治报路线。

大群还批判我们要“通过政治报将其他手工业小组联合到一起发展成统一的组织”。如果其是指责我们提出的“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

革命力量的行为”这一目标，那这些写手看来根本不理解政治报的真正作用（《共产主义者》编辑部《关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不是所谓的把互联网上的各个小组吸引过来搞松散的左派大联合，而是为了建立有战斗力的列宁式政党来终结学生和工人中那普遍的迷茫，一种“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的迷茫（弗·列宁《怎么办？》）。

第三，其攻击说“空谈什么没有脚手架和次木料的奇怪比喻”。我们想请问大群的写手们：这个比喻是哪里来的呢？不妨让我们看下原文：“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弗·列宁《怎么办？》）。我们能忍受这些自称要贯彻政治报建党路线的批评家们没有看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或《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但实在是没想到大群的写手们竟然连《怎么办？》都没看过。也许在他们发了疯地、以列宁为挡箭牌地骂战过程中，列宁已经变成了只会用“奇怪比喻”的反革命分子乌里扬诺夫。这让我们非常地好奇：他们支持的到底是哪个或者谁的政治报建党路线呢？答案估计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第四，在我们上次的回击文时，我们批判大群不理解政治报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如今其更彻底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在大群的理解中，政治报和政治组织必然需要有个机械的先后划分，仿佛报刊产出、组织建设是按部就班的“政治报先、组织发展后”，而非相辅相成的。实际上，要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敲定两个核心问题：政治报要建立的政党是怎样的？政治报又是如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这类组织的？

《火星报》就曾重点定义了政治报路线所要建立的组织样态：“作者（注：尔·纳杰日丁）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弗·列宁《怎么办？》）。从当时《火星报》所做出的呼吁来看，政治报所要建立的组织不单纯等同于每天写写闲文的左圈茶话会，而是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与政党，这一目标绝对不能被撼动。

那政治报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列宁曾这么分析道：“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和马列毛大群的刊物《燎原》之区别就在是否意识到这一条“基线”对于组织发展的意义。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当通过政治报吸引到了全国、全球的革命者时，我们选择将新进的同志们编入支部，在组织生活和各机关的工作中继续扩大、细化、专业化我们的政治刊物，并围绕着一个全国政治报体系（中央机关报 + 工人报刊 + 青年报刊）来进行工人工作（对工人传达我们的纲领并串联起各地的工人小组）、学生工作（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和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的筹建。而《燎原》的路线是

将人拉入一个有 2 万群成员的闲聊大群，让他们自己找所谓的“真同志与真战友”还有永久发言权。

我们对政治报的要求

在分析过一个中央机关报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后，我们有必要对其中提到的各功能做下细化，并着重提出我们对政治报这条“基线”的要求。通俗来讲，就是政治报不要什么、需要什么。

政治报不要“香槟塔”思维。何为“香槟塔”思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个经典的、由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涓滴理论”，即期待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投资的方式造福社会，把财富像香槟一样从顶层缓慢地滴到底层以实现再分配。可笑的是，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欺诈式理论竟然在大群等组织的刊物传播策略中再现了。不依靠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基层党组织，一份政治刊物能传播多远、传播到哪、传播给谁都是毫无定数的，而基层党组织又是否能够壮大成线下党支部或政治中心又是彻底地“凭缘分”。

是的，在外网发布的那些刊物是有在内网传播、《共产主义者》和《燎原》都在各个墙内左群中被传阅，但政治报的目标不只是让更多人阅读，而是看是否能将读者们动员至统一的政治工作中。就像经济学中的香槟塔无法真正地实现财富再分配一样，政治刊物传播中的香槟塔也无法通过随机的、离散的流通达到培植革命组织的目的。

换句话说，认为大群的政治号召力因《燎原》在内网的传播而增大就等同于说一群落难之人被救出荒岛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他们刚扔的漂流瓶肯定还在太平洋某处浮沉着。我们还要指出，经济中的涓滴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对财富的积累而变快，大群政治报的效用也不会因为其写的八股文变多而改善。也就是说，哪怕大群的写手们能几周写出一百篇“干钧棒”，其内外部的情况也不会得到丝毫的改变。请这些八股文专家们好好地思考下，无产阶级的困苦到底是因为资产阶级还不够富有造成的，还是由阶级的壁垒所决定的？我们想这个比喻应该已经足够通俗易懂了。

政治报不要原子化产出。产出的原子化本质上就是无视组织化手段所造成的恶果，而马列毛大群的网站“布站”就是一个值得被点名的典型。假如我们现在打开布站，映入眼帘的就是大量的各种闲杂短文。这些每天就能涌出来十几篇的短文都依照着同一个八股文结构：

1. 本文要批判什么

2. 中修 / 中袖 / 赵修的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有多么丑恶

3. 真正的出路是我们要用政治报为脚手架的方式……搞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融工……建立地下红军……搞地下审判……翻边战术……转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

这类马列毛的特色八股文结构适用于其发布的九成文章（保守估计）。不过这种八股文也是其原子化内容的唯一标准了，毕竟在其发布的成百上千篇文章中猎奇内容实在是难以统计：有我们先前回击过的上百篇“干钧棒”、有在网上搜完泡面教程之后灵光乍现的《从泡泡面联想到的——一批天才论》、还有难以想象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列出的《“安全警长啦咿啦哆”批判》。我们想由衷地做个建议：麻烦大群的写手们在反复重复政治报路线的重要性前，先自己瞪大眼睛看看自己的文章都在写些什么。

与之相反，《共产主义者》所追求并实践的标准截然不同。我们的所有非投稿文章都是由组织力量来进行规划、写作、编辑、发布与传播，且编辑部对本机关报的一切产出负责。《共产主义者》执行这些标准不是因为我们泡方便面的时候悟出来的东西比马列毛大群多，而是我们知道当大难临头时，能够向无产阶级传达我们的革命纲领和动员能力的是《必须成立党》、《在暴力革命的战线上》和《年度工人调研报告》，不是什么《“安全警长啦咿啦哆”批判》。

那么，政治报所急需的是什么工作？政治报需要的是一体系化的、高质量的产出以及能够支撑这一切的集体。让我们再看一个也许在大群眼中是“奇怪比喻”的分析：

“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弗·列宁《怎么办？》）。

由此可见，政治报路线并不是单纯的、古板的创办报纸，而是以机关报的思想和信息作为标准建造一栋“巨大建筑物”。因此革命家所需要考虑的是：机关报这根引线是否严谨（理论体系、纲领和方法论的研究）、石匠的技术是否娴熟（对组织内成员的教育和培养）、石头的质量是否过关（对组织建设、工人工作和学生工作等诸事业的深化）。

而与我们的工作相反，革命运动中的空想家希望出现的是只要他们拉出一根（不顾曲直的）线，那栋建筑就会在没有石头和石匠的情况下自己拔地而起。让我们都停止幻想和呓语吧。一根引线如果脱离了石头和石匠就只能以一根线的形式存在，一份政治刊物如果脱离了实际组织建设，那它将只是一份讨论政治话题的普通出版物，而非一份能组织起一个集体的、《火星报》式的政治报。

既然大群的写手有胆量说出“要革命去大群，要学习去布站”的惊人言论，那就请他们做些自查，看看马列毛大群到底有没有革命性，“布站”那如垃圾山般堆起的“真正的”、“全国一盘棋的”、“基于翻边战术”的学龄前儿童动画片批判又有没有学习价值。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马列毛大群的骂战再起：一些建议

作者：向亦秋



我们希望给《共产主义者》频道的所有读者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从互联网左派的骂战狂热中提取出一些值得被传阅的经验与警示，以供当代的革命者们认知到左圈的现状。

首先，学会培养耐心并改掉断章取义的习惯。这一点虽然我们已经强调过了无数遍了，但是马列毛大群的攻击者还是无法戒掉这样的辱骂方式 - 《共产主义者》每有新文章发布，其就要把整篇内容裁剪至细碎才能吞咽下去，蠕动入自己毫无墨水的肚子。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如果这些写手们只能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做政治批判，那其所提出的武断结论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就以我们对民主集中制的分析为例。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和《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两文中，我们对如何理解、如何建设、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做了详细的、大群无人看完的阐述。但大群那些耐不下性子阅读的、劫掠式的写手们就是要拿着自己摘抄的只言片语对革命者发难：其先是质疑我们搞泛民主制度，在我们详细解释了组织架构后其又说我们没讲对党员的政治要求，想必在这次的反击后他们还要继续抛出各种我们在文章中已经给出过答案的问题。直至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他

们到底是要批评《共产主义者》，还是需要我们搀扶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阅读《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妨把他们的责问和我们早就写就的文章原文并列摆放，看看他们在批判我们前究竟有没有看完过哪怕一篇我们的文章。

马列毛大群在不到一个月前攻击道：“为什么要民主集中制？如何搭建和使用民主集中制？怎么保证正确路线的正确集中？怎么发挥基层民主从而实现民主集中的对立统一？这些问题我们共革阵的“革命家”先生们都是不屑于回答的”（佚名《干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的反革命路线》）。

关于“为什么要民主集中制？”，我们在2025年8月1日发布的文章中如此叙述：“民主集中制是为了在资源极其有限、形式无比紧张、压迫和打击随时都先悬在头顶的、这个阶级斗争的动荡时代，革命者们有效组织起力量反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关于“如何搭建和使用民主集中制？”，我们在10月3日发布的《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讲过了如何利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全党代表大会和支部的形式“搭建”起一个组织架构，而同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叙述了如何“使用”这一架构：“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活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公式。维持他的健康运作，需要全体党员，尤其领导干部，时刻保持警惕，持续不断地同官僚主义和自由散漫这两种倾向作斗争”（《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关于“怎么保证正确路线的正确集中？”，还是在《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想要的党内民主，绝非小资产阶级式故意创造出分歧彼此看着不顺眼各自为政；我们想要的是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分歧不是好事，而只有通过统一的交流和行动而非分裂才能被彻底消除。这需要干部们用合适的方法统一成员们的政治思想，以推进行动上的一致，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基层革命者视为服从指令的‘下属’。用政治手段争取同志们，为上策；用组织手段约束同志们，为下策。与其将我们的党比作一台机器而成员们皆为螺丝钉，不如我们党是一颗树而同志们皆为细胞。”

关于“怎么发挥基层民主从而实现民主集中的对立统一？”，还是《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基层的支部生活同时也应该得到建立，党支部是党的基础，支部的会议、政治学习、任务分配和工作汇报，是防止党员变得懈怠、锻炼党员、执行决议的基本保障……”，且“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行完善，通过层层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是实现大规模组织民主的核心机制”。

那位张口就是责难的写手认为其提出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屑于回答的”。事实上，共革阵不是不屑回答，而是不知道还需要专门为这些一拥而上的攻击者们复制粘贴一遍我们写的文章，为其答疑解惑。所以我们再次还要再做个声明：本文所截取的不是上述两篇文章的全文，请这些浮躁的攻击者们先不要急着断章取义。

其次，学会意识到行为的本质。就以《“安全警长啦咻啦哆”批判》为例，如果本

文的作者不用打倒中修干革命之类的词语，那这就只会是一篇写来出气的杂文，但一旦在“布站”挂上了要搞马列毛主义推翻中修的名号，其瞬间就被认定为了一篇革命理论文。同理，那上百篇“干钧棒”本质上不过是撒泼打滚式的辱骂，马列毛大群还大言不惭地用“这是路线斗争”来正当化这一行为。

在上百篇干钧棒八股文中，有一句话大群说的尤其好——“苹果不是因为名字叫苹果才好吃的”。没错，按照这个说法，骂战杂文也不会因为被套上了个路线斗争的幌子而产生任何的革命性。由此，我们不能因为其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真正的政治报路线”而把其文章内容的杂乱无章、政治素养低劣和逻辑缺失一并忽略了，这将阻止我们看到其本质的卑劣。

不管马列毛大群如何强调自己要坚持政治报路线，其对政治报路线在理论层面的肤浅理解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是由实践层面上的缺乏造成的。就像文章先前分析的，我们无法跟一个没实行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解释充分讨论的作用，我们也没办法帮助没实践过政治报路线的组织意识到刊物是需要质量要求的。

最后，我们还想说：《共产主义者》不回复大群的歇斯底里不是因为“干钧棒”说的属实，而是除了互联网骂战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得到落实。全球经济愈来愈逼近一场危机、帝国主义势力所推动的台海战争也存在极大的爆发可能、全国的无产阶级依旧游离在原子化的零散斗争中……这不仅代表着留给革命者的时间不多了，还代表着我们已经没有过多的闲暇时间来照顾大群写手们那渴望关注的情绪了。

这次我们选择再次回击大群必然会让它们感到兴奋。它们会拿出自己全是偏见的透镜来审视我们的文章，从中拿出那些可以看懂的、可以扭曲的、可以造谣的部分继续产出一百多篇八股文，然后宣布自己又一次在所谓“路线斗争”中获胜了。

这都是可以被预料到的，我们也无意改变那些已经在左圈内沉浸过久之人。我们想要做的是组织起在左圈的骂战中被迫沉默的大多数。在共革阵内部，我们见到过了许多曾经怀着革命热情加入到马列毛大群之中的成员。他们曾发现没有工作能在大群内部得到推进，甚至一年前的大群和今年的大群除了群成员数和八股文的产量外就没有任何差别。如今，他们并没有在失意中导向政治冷感，而是被《共产主义者》这一基线组织起来并展现出了出色的素养、能力以及态度，这正是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

读者同志，也许在大群对我们的攻击中你不知道该相信谁、加入哪方，也许你曾经加入过马列毛大群，或者你现在正在左圈的泥潭中，不知道该如何脱身。无论你的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在不忿和孤独中度过的，请放眼看看共革阵的纲领、成果和想要改变的现实。

无论你觉得怎样势单力薄，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必然需要你的力量，让我们组织起来，为了终结中国左圈的混乱、反抗现实中的压迫并一同走向一个共产主义的明天。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内地工会发展现状及 工人组织形态探讨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一、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自 2001 年起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经历过多轮抗争与高潮，其中也表现出相当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动特点。在这些特点中有许多是历史上曾发生过，并且有正反面例子的，也有些特点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独有的。笔者认为在分析工会问题之前，先从历史事件中切入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工人运动所处的位置，也有利于明确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以加入 WTO 为起点，中国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然而我们要知道，任何生产关系的改变首先是从它原有的历史条件下转变过来的。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历史条件即是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在转变经济体制之前，中共的官僚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构建一个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我们因此了解为什么中共需要在改开之后宣布国有企业和所有制改革——官僚们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中相对平衡的物质生产，并且通过贱卖国有资产完成中国的“圈地运动”，最终制度性的构建起了一个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少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社会。至此，资本主义迎来了自己在中国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工人运动莫过于东北三省大庆、辽阳、抚顺三大工潮。三者均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大庆工潮有大约五万人参与。这三地的工人均是在国企改革后的失业工人，他们对改制时期工厂干部的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自身利益受损极为愤怒，且对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依然怀有模糊情感。这使得他们的诉求主要在经济利益，只有零星的工人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上的质疑和声讨。有部分地区选举了工人代表，但绝大多数都只有散漫的组织和自发的罢工运动。这种运动很快就被国家机器镇压和消灭。我们在此处已经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调和缩影，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此后的无数工人运动是如何重蹈覆辙的。

2005年-2010年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工人运动主体包括国企下岗的员工与农村所有制改革下生存困难、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而是劳动力远远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家只需付给工人维系其基本生存的工资，而工人则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中共则有意促成了这一过程——是的，我们在此时看到的超长工时、工资拖欠、社保和劳动保护缺失、乃至外包和劳动派遣现象都并不是中共不想管理造成的，恰恰相反，整个官僚系统完全明白，且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原因并不难猜，官僚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其需要资产阶级的崛起（只要这种崛起不至于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和对其的直接控制来间接控制生产关系并统治无产阶级，进而统治整个国家。

在这一阶段，工人遭受到严重的剥削，他们工资仅够维持自身生活与再生产，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剩余劳动时间也被无偿占用。这一阶段的工人运动相较于上一阶段有所进步，比如工人组织的组织虽不严密，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先进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的工人领袖。这些工人领袖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工人们学会了通过媒体（当时依然是广泛的纸媒和中央媒体）以及整合诉求来向政府施压。但这种组织和运动依然是工联主义的，以争取经济利益为主。其中也有如05年友利电公司要求成立工会一案（最后由全总协助建立），但几乎没有见到索求政治权利的事件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公开选举工人代表、成立独立工会、乃至直接同中共的政治对抗。

2010年至2017年之间，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起前五年更加猛烈，无论是罢工事件总数还是罢工参与人数都迅速增长，中国劳工通讯在08-10年，11-12年，13-14年，15-17年收录的工人罢工数量分别为100件，270件，1793件和6694件。可见即使是现在互联网上鼓吹的“黄金时代”，阶级矛盾依然相当尖锐且持续不断发展。随着中共对旧有国企制度的全面清算，工人运动的主体转变为农民工及其子女。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呈现两极分化的状况。一些工人运动趋于“理性”——有严密的组织团队，有序的行动，明确的诉求，和平的罢工手段等等。如15年广州市的利得工人罢工事件，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破坏生产设备、游行和堵路行为。工人们甚至组成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程序，并选举了工人代表同资方谈判。有NGO组织加入其中并为工人们提供媒体宣传和资金管理团队。在十个月以来的抗争过程后，工人们共获得1.2亿元的补偿，创造改开以来中国劳工集体维权获得补偿金的最高

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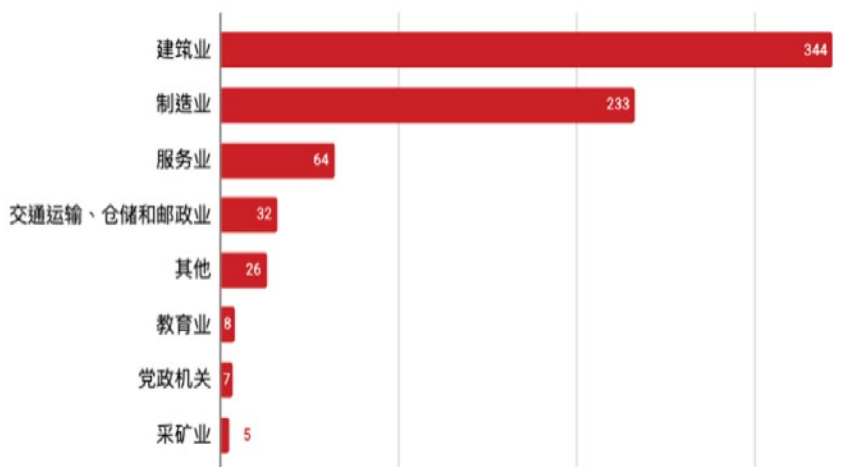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运动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工人运动都并非上述事件一般“理性”。一方面，中共宣传要“保护劳动环境，调和劳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在事实上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维权难，讨薪难，一旦遇到卷款潜逃的资本家，数个月的劳动极有可能换来颗粒无收的结局。当宣传机器鼓吹的美好生活同自身具体利益受损相结合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他们深信，出路只有把事情闹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而上述的“理性”运作又几乎必定遭受警察的威胁甚至抓捕（利得工人事件中的 NGO 律师被中共抓捕并判刑）。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些工人运动常常是突发的，情绪化的，甚至是盲动的。一次工作中的小问题就可能点燃工人们积压许久的情绪，引发一场罢工，当中共政府试图从中斡旋时，甚至找不到工人代表了解诉求。

2024上半年中国工人行动综述

罢工抗议高于去年

工厂逃避欠薪赔偿致大批工人不满

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行业分布



中国劳工通讯 CLB
CHINA LABOUR BULLETIN

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据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乎所有工人运动的战术手段都更加多样化了。10 年南海本田罢工前就有工人们组建 QQ 群，罢工中通过各类通讯手段（电话，短信，QQ 群）广泛鼓动其他工人参与罢工。上述利得工人罢工运动前，工人们就建立了各类工友群与工会代表群，并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设立信息发布平台。罢工时期通过这些电子通信手段，对内组织和动员工人，对外阐明立场并争取社会支持。罢工过

程中甚至发布了工人组织的报纸《利得工人维权简报》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海量的关注和声援。中共的警察在抓捕了几位工人代表和 NGO 成员之后被互联网舆论声讨，在自媒体和工人压力下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16 年沃尔玛罢工时期，工人代表建立了网络论坛，有接近两万名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员工登录论坛并批评沃尔玛的工时制度。此外这次罢工罕见的出现了国际主义的联合行动。该组织同美国的沃尔玛员工组织通过网络进行联络，美国工人们在这次联络中分享了罢工经验。

这种战术上的突破并不能掩盖工人组织战略上的盲目性。南海本田罢工初期就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QQ 群中提出了一百多项诉求，线上的信息流通也只起到聚集人群的作用，早期只动员了少部分工人参与罢工。但工人们依然在学习和成长，不断修改关键词避开官方的审查，同中共打“赛博游击战”，耐心听取意见并通过讨论历史案件来吸取经验和教训。

二、中共的官方工会（全总）与政府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全国唯一的合法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

既然工人的处境如此困难，全总是否有帮助工人，改变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呢？很遗憾，全总以及背后直接控制全总的中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起着完全反动的的作用。在维权问题上，早在 06 年全总就提出“两个维护相统一”，也即“维护全国人民利益和维护职工群众相统一”。我们要问，这里的“人民”是谁？所谓“人民”根本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称呼，实际维护的当然是中共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全总不再履行《工会法》所赋予的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责，它甘愿将自身置于中共的领导下并成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了维护中共的利益而摇唇鼓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工人罢工或游行时总是看不到工会的身影，反而是政府和警察出面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说它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呢？因为全总占据了全国唯一合法工会的位置。这个橡皮图章最大的作用就是否定任何工人自行建立工会乃至地下左翼团体建立工会的可能。这使得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都被全总视为直接

挑战中共政治权威的“非法组织”。现如今，全总作为中共官僚系统中知名的“边缘”部门，其所能够做的无非是逢年过节发一发米面粮油，拍些照片报导，做做表面功夫而已。而对工人而言，一旦遇到劳动纠纷，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劳动仲裁而非工会。

综上所述，全总虽被称之为工会，但在事实上没有承担起作工会的任何职责，在目前的劳动体系中近乎透明。其甚至不具备一个组织最基础的作用——将它的成员聚集起来。因此，除非未来阶级矛盾加剧迫使中共重启全总这个事实上毫无作用的机构，否则笔者认为，在全总内部开展工人工作是不可能的。

三：阶级调和与自由主义的工会

当前的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中共主导的，以平衡劳资冲突为核心的工会？有这样想法的人在中文互联网上不算少数，他们最喜欢推崇的就是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和朴正熙时期的韩国，认为牺牲工人利益和政治权利是“必要的牺牲和一时的痛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收益要远比抽象的劳工权利更重要。这种阶级调和论反映在工会问题上就是：工会不但不应当支持工人使用罢工和抗议等激进手段威胁资方和政府，反而应当站在“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上，同政府一起居中调节劳资冲突。我们在此处要指出，这种思想看似进步，实际上却带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虚伪地、“温情脉脉”地同情。他们认为罢工破坏了社会的财产，却又不肯说明这些被破坏的财产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也不敢说明这些被破坏的财产是由哪个阶级创造的。他们认为工人们不能进行自我组织，并且通过这种组织主动的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只能像工厂中的机器一般麻木地听从资本家的指令。如果我们对这种阶级调和的论调进一步深挖，就会发现它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工人阶级已经放下了罢工这种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武器，那又如何保证另一侧的，占据统治地位并控制暴力机器的资产阶级能够继续维持对工人的让利呢？恐怕对于这些人而言，最理想的状况就是给予工人恰好能维系其再生产的成本之后，将所有从工人阶级中榨取而来的剩余价值继续投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而对于他们吹嘘的韩国“汉江奇迹”和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而言，我们则要指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韩国有冷战时期美国的扶植与东北亚地区中心的位置，新加坡则是扼守马六甲海峡，靠着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的超额利润来缓和阶级矛盾。而中国则同这两个东亚和南亚的小国完全不同。以对外出口和对内投资为核心的经济系统必然需要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进行血腥地压榨，换言之，利润的主要来源并非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而是国内的无产阶级。况且这些调和论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今的经济状况恰恰是中共执行阶级调和战略的结果。也即通过强有力的压制无产阶级意愿，调控宏观经济，最终达到他们“高效”的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目的。因此，工会的任务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被纳入了行政体系——一个没有工人的“工会”显然更高效，也更稳定。此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理解，为何阶级调和论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它的设想中，国家、工会与法院是为了居中调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而不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如果读者明白了，在当代中国，阶级调和论在理论与事实上的破产。那也能明白自由主义为何行不通。在政治层面，主张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根本承担不起推动政治改革的任务。自由主义既不能动员起底层的无产阶级，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也不能撼动中共波拿巴政权的上层建筑，甚至还会被其所宣传的民族主义理念当成西方意识形态入侵——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巩固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两种意识形态下所领导的工会均不能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可能在中共的眼皮底下组建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

四：工人自组织以及如何开展工作

“这是否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时代，独立工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问题这样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的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改良派工会。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革命的工会，它们非但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是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任务。”（托洛茨基——帝国主义衰败时期的工会）。而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种萌芽制度的工会状态即是工人的自组织“工会”。这种自组织在如今的中国并不少见，只是这种组织并不以独立工会，工人委员会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名字出现。工人自组织无疑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产物。西欧工会制度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已延续近二百年，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长期斗争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建制。而如果读者曾阅读过我们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一文，就知道我们在那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论点：中共自建国以来就未曾建立完善的工人民主制度，直到中共右派官僚上台之时，工人及其组织依然不是可以影响上层建筑并主导具体政策的一股力量。而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共对任何可能形成威胁到政权的工人组织都严加提防（如08年薄熙来纵容出租车司机罢工与同意出租车司机组建工会一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自建国以来就几乎没有民主传统和独立意识。但工人们仍凭借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机器自发地组织起来。因此，只要往前多走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今的各类互助组和群聊。以最近发生的长沙骑手抗议为例，这场运动于12月22日下午发生，傍晚就聚集起一整个地区的骑手，不可谓不高效。我们由此也能看出这种自组织潜力：虽然一个群聊只能容纳几十或数百人，但凭借现代的网络通讯技术，某个地区的突发性冲突能够迅速传递至数个工厂乃至一个地区的全部从业者。而由于工会在组织方面的缺位，自组织本身较淡的政治色彩反而给予了其相对的隐蔽性（中共不可能在所有群聊和互助组内都设置监查哨）。这种相对的隐蔽性也让革命者更容易融入这些小型的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可能引发的危险也更少。但这绝不意味着未来的工人组织也必须像游击战一样以小股势力为单位同中共对抗。这种自组织的弊端也因其相对隐蔽、规模较小而更为突出：即使在一个几十人的小圈子里也是山头林立，且圈子之间有强烈的行会主义风气，对其他行业的工人运动抱有冷漠和戏谑的态度。这一点倒是同当今互联网上的“左圈”如出一辙。群聊内部不但意识形态复杂，且不会区分政治探讨与日常事务。这导致群组内部的工人只能在被剥削的状况下原地打转。还以上文的骑手抗议为例，这次抗议仅仅只是声讨歧视骑手的女业主，而没有哪怕是经济上的诉求和纲领。这在一方面凸显了这种自组织在突发性的运动面前的散漫，另一方面也导致其不能获得其他行业工人与市民的支持。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这次有一个内部的委员会可以组织骑手，并且提出一定的纲领（如“骑手也是人”“抵制对骑手的无端污蔑”“抗拒平台算法，保护骑手尊严”等口号），也绝对不会让

抗议如同落潮般快速散去。

我们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开展我们对工人的工作呢？一个首要的关键是，开展工作的人本身不能是只在互联网上指点江山的“网左”，而必须是直接参与到工人实际的生产中的人。因为要组织起工人，就不能像中共的官僚一样命令工人，也不能像先知一样游说工人，而要像一个真正的工人一样工作，同工人在一个战壕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融入工人群众，才能让工人群众明白谁才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我们在《工人调研报告》中指出的一样：“革命党人不通过和实际的工人的更多的互相了解、更多的配合，不更多地在实际工作与斗争（这种工作时而迅速而激烈、时而则处于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当中争取和加强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信任，工人们又怎么会仅仅因为我们声称“我们代表你们的利益”，就贸然地跟随这个所谓的组织政党？”其次是区分其中的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区分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进入这种组织的初期或许还能通过针砭时弊和日常交流判断其觉悟高低，而一旦认定其可以作为革命的联系者，就必须主动的将日常事务同政治问题相区分开。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工人组织的纪律性和严肃性，也才能为有效的政治教育和未来同革命党的沟通打下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开展这种工作无疑是艰苦的，要在原本繁重的劳动中抽出自身的额外时间去同工人进行沟通，要开导觉悟较低的工人并同可能的右派进行争辩。这无疑也对革命者的个人素质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素养过关，沟通能力过硬，耐心细致有追求，稳定坚韧不动摇。

五：地下革命党领导的工人组织

对上述自组织开展工作的任务并非革命党首创，原子化的“融工家”们可以说走在了我们之前。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融工的同志们也留下了相当多宝贵的经验。但其错误在于，没有一个革命党支撑这种融工活动，且这种融工活动也不能将工作中遇到的先进分子发展到革命党的组织里。前者导致融工总是因为资金和人员问题而出现短期化和不稳定性，后者则意味着工人们只能在低级的工联主义中止步不前，而不能提出更高的政治纲领。在了解其错误之后，笔者认为，在老一辈融工家已经退出的当下，在工人中发展组织的重点是将革命党和工人组织联系起来。这首先代表我们不能从过去的工会制度入手，因为工会制度是服务于已经有部分阶级意识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据前文分析，中国目前并没有这种机关。其次，工会本身的官僚倾向也必然是同革命党的彻底性相悖的。“鉴于共产党人希望革命行动尽可能是有意识的和负责任的，从而希望对工人转入决定性进攻的时机的选择权（如果谈得上选择的话）属于工人阶级中组织成为社会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的最有觉悟和最负责任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人不可能希望工会丧失其纪律性和集中性”（葛兰西——《工会与委员会》）。

因此，这种组织制度应该在工人和革命党之间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与革命者的桥梁。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先进工人分子与深入工厂中工作的革命党员。这样的组织形式保证了地下革命党的秘密性与工人活动的公开性。而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工人委员会也就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对于革命党而言，工人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们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向工人群众们进行政治教育并宣扬革命思想等；而对工人群众而言，工人委员会不但提供了一种组织化的生活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原子化侵蚀，更能通过这种组织来提升工人的阶级意识，在

工人委员会日常的议程和选举投票中教会工人如何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也即：“全体群众参与委员会的生活，并感觉到，由于这种参与而成为一股力量”（葛兰西——《工会与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必须摒弃自组织所带有的弊端，首先是将严肃的政治活动同日常活动分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允许在日常交流里讨论与批判马列主义理论与时事，而是要求工人在关于全体工人利益的事件上绝不含糊。在罢工时期要共进退；要严肃的惩治工贼和占领工厂；要在不放弃底线，也即不损害工人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灵活地同警察与政府对抗。还要在内部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行会主义做斗争，让工人们明白自身的利益是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



1919-1920 的意大利“红色两年”

同样，工人委员会也应该同作为更高的的组织形态的革命党一样，向工人们（如果可以，也应该同其他无产阶级）提出自身的纲领。以某个地区的骑手组织为例，从这个地区的骑手组织所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就该在提出类似的纲领：我们是这个地区的骑手，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维护本地与外地的，骑手与其他工人的利益。而作为被这个地区的骑手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我们则负有对整个地区的骑手的利益责任。而具体到各种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工人委员会也应当作为运动的核心组织参与其中。例如在罢工运动中，工人委员会调配物资，保障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正常生活，提出并宣传罢工运动的口号与纲领，同政府与资方谈判以求为工人谋取利益等；在抗议运动中，工人委员会则提出口号与纲领、印刷传单与海报、声援其他组织等。这些事务绝非目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或者某个行业内部的几个小山头能够做到的，只有在组织起来的革命党的主动参与和领导下，才能使得工人阶级发挥其真正的潜力。毫无疑问，在中共的政治压力面前，这种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些战术性的问题仍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是否要向工人们公开部分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是否要在工厂内部聚集工人群众，是否要在工人之间使用具有加密性的软件进行联系等等。

六：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其生产部门分布的广度、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从前一切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想象。但在阶级矛盾愈发尖锐的当下，工人的组织度依然相当之低，在战略方针上对比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更可谓毫无长进。这一部分是由于中共的反动统治，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以来整个中国都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或革命党。我们不能希望原子化的工人能提出任何政治纲领，也不能认为革命会因为压迫与剥削自动到来。吸取工人运动和融工家的教训，组建一个由革命党直接参与和领导的工人组织是将是我们眼下急需面对的任务。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中国特务机关的常用手段与我们的对抗策略

作者：翟朔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建立组织、连结群众的同时，革命者也被迫地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作战。此前，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提醒了同志们隐藏自己、保持安全的必要性与有效方法，但我们需要给自己留好一个“底牌”：那就是，如果危险降临，我们如何保护自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并做好反制的准备。

一、黑白脸策略：软硬兼施

当局在针对革命者的审讯中常常使用所谓的“黑白脸策略”，在国安这样的特务机关中最为常见。过程里，两名审讯人员共同对革命者进行审讯，首先一人大声叫嚷革命者做的事情多么严重、将会面临什么下场，提醒处境有多么危险，这个人物就是通常所说的“黑脸”；随后另外一名审讯人员将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如果配合它们革命者就能获得宽大处理甚至是重新取得自由，有时它还会“劝”所谓的“黑脸”控制情绪不要太过于严厉，这就是所谓“白脸”。

事实上，抱有“只要我坦白就能真如白脸所说的那样从轻发落”的心态完完全全就是幻想。对于挑战政权的革命者，统治阶级不会手下留情，除非在国安的刑讯逼供下革命者成为了一个“废人”、一具“行尸走肉”、一个这辈子再也不敢接触政治的日子人，否则特务机关不会降低对革命者评估的风险等级。如果通过成功让自己真心成为一个“废人”躲过风险，那原先的那个革命者事实上已经被“处死”了，变成没有理想的一具空壳。想要以此自保的人，本身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争取的对象，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阵线认为可以称得上是革命者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因为“黑脸”给出的压力选择去相信所谓的“白脸”打出的糖衣炮弹，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为了让被审讯的革命者放下戒备，相信他们的“鬼话”出卖自己的革命战友、出卖自己组织的种种信息。一旦被审讯者掉进了它们的陷阱使得它们的目的达成，它们就会展现出真实的面目，所谓的“黑脸”、“白脸”必然都成为完完全全的“黑脸”。界时哪怕被审讯者终于认识到了它们的意图，也为时已晚、木以成舟。有句话叫，“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

是否有出卖战友、放弃理想的人，真的在为特务机关提供帮助后，“证明了自己的

价值”所以被从轻处理呢？事实上这也是有的——如果这些交代没有被动地给予特务机关更多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的话——这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叛徒”。我们说，对于共产主义革命者，这个自保方案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这样想的人应该首先反思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政治里来！既然个人利益比政治利益、比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比组织的安全更高，那为什么要让自己惹上麻烦？他们把政治当成过家家，不明所以地就被卷入到漩涡之中。

我们不怕这会“吓走”部分人。我们不需要孟什维克的组织方法，不会弄出一个没有边界的、同情者的俱乐部，我们要的是布尔什维克，要纪律、义务、责任感和最崇高的牺牲精神。该走掉的人，早晚会走；不谈可能的风险骗人参与到政治里，就是一种谋杀，对组织和个人都不负责任。

二、原子化与隔离

革命者要获得信心、开展工作，就必须组织起来形成团体。特务机关要瓦解信念、消灭成果，就必须让革命者们人人自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里。

对革命者的抓捕，特务机关从来不会愚蠢地“打草惊蛇”，让革命者们循序渐进地认识到威胁的逼近并加强防护。所以，抓捕往往都是集体、同一时间联合行动的，这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因为安全问题覆灭的各种政治团体的经验中，例子数不胜数。他们争取这样“一网打尽”，要不全部抓捕，要不希望重要成员的失去让组织自我瓦解。

我们承认，对于诸多松散的政治团体来说，这样的手段足以让特务机关达成目的。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打造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去扛住风浪、挺过危机。特务机关“赶尽杀绝”的企图，将在一个真正严肃的革命组织、他们的真正威胁的反制下，成为可笑的幻想。十几年的屠杀也没有让沙皇达成自己的目的，最终地下室成为了一家子的最终归宿。

我们从来看不到特务机关会将革命者们集体审讯，他们往往通过阻隔接触、单独关押的方法形成一种“囚徒困境”：这样如果是编出来的口供将会无法串通，很容易会被看出破绽。而且，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和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通常都是很难有真正“自律”的。在确保没有更多人知道也不用担心他人审视、批评的条件下，很多所谓原则和信仰都会变成耳边风。革命者们只要还能看到、听到彼此，就会有一种不论是道德还是脸面上的压力，告诉自己不可以成为叛徒、不能展示出软弱的一面求得安宁。

但是，当被欺骗“其他人已经招供”后、无法得知其他人的表现时，革命者就有了一个心理上正当化自己的懦弱和退缩的理由，告诉自己“大家都这样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最后成为自己最痛恨的人。原子化的隔离手段力图消灭革命者之间的信任，消灭革命者对革命组织的信任，消灭革命者对自己信仰的最后一份坚持。

它们用这种信息差，挑拨革命者们彼此猜疑，将人自私的心理无限放大。同时，特务机关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挑出队伍里真正有威胁的分子，就是那些坚定、无法被

撼动、有党性的战士们。它们通过消除先进革命者对落后部分施加影响的渠道，让队伍分道扬镳。

我们如何反制？组织建设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对彼此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可以让物理上的隔离切断不了革命者们政治上的基本共识。只有事先为这种隔离做好了准备，才能在危难之际不慌神。要培养独立的思维，有在无需他人督促的情况下，也清楚自己的原则的革命者。

三、中国特务机关的性质

在中国的特务机关内部，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良心犯”，指的就是没有犯法、没有害人更没有作出违背良心的坏事的好人，只是因为得罪了这个“合法犯罪”的政府、体制，遭遇迫害的活动家、仁人志士或革命者。

必须清楚特务机关和中国常规警察机关的不同。所谓“国安”，在名义上是反间谍的情报机构，在实践里是维稳、打自己人的中流砥柱。隶属于公安的民警、政治保卫警察都只是充当打下手的角色。特务机关不同于有正规编制的警察，它们干什么、是什么人，从来都没有公开情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是“国安”的人，这得益于它们秘密的产生方式，也因为做着见不得人的脏事，它们不得不进行隐蔽。

它们无法独立使用社交媒体和外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自由程度相比于监狱里的囚犯好不了多少。那它们为什么仍然忠于中国政府？这绝对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忠诚，或者它们真的以为自己所做是“正义”的。国安听得到一切反对派的声音，很清楚中国社会的不公和压迫真实存在，很了解自己效忠的主子是个多么腐败、虚伪和反动的政权。从之前“良心犯”的例子就能看出，特务们清楚自己的下三滥，也知道在政权垮台后，自己作为恶犬会如何被清算，所以它们的子女和长辈，都被秘密地转运到海外生活。在美国的尔湾、英国的伦敦、加拿大的多伦多、新西兰的奥克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类“国内吸血国外潇洒”的、无人性的残渣遍地都是。

它们往往是从中国部分高校的特定专业里、通过私人关系等渠道，配合金钱和物质上的巨量利益被招募。中国政府花费了相当多的资源去收买这些无耻之徒！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且高出同年军费7%。不用多说，在2026这个数字只会更高。军费往往都是一个国家开支的大头，但在中国却反常地远远低于对内镇压所需。我们可以想，这部分的维稳经费主要花在哪里？是供养庞大的辅警吗？但凡了解现实的人都清楚，两千块钱一个月打发、没有编制的辅警，无非就是中共雇佣的基层保安。是武警吗？在周永康政变之后，中国武警的独立性和力量是被削弱的，尤其是其在镇压群众运动的角色上被淡化了。从最近大规模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中就可以看出。越花越多的钱，流向了什么看不见的地方？

政府宁愿去养着这群混蛋，也不愿意分享一点财富给群众以缓和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这种几乎疯狂的统治方法，和覆灭前的国民政府越来越像。它们已不再追求长久治安，只希望在毁灭前放肆狂欢；它们不在意明面上的合法性，只希望用暴力的手段吓坏人们、堵上先进者的嘴。它们认为，如果给中国工人阶级作出让步，这种

改良主义的方法是不会起效的，因为庞大也强大的中国普罗大众必然会在获得了信心后，去要求更多、愈发大胆。这点上，中国共产党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会因为他们提供幻药而被麻痹，但它们也走投无路，这样对于工人群众来说，只剩下彻底的革命一条出路。

分配紧缺地段的优质住所、给予诱人的户口、高薪资高福利和对子女的一系列特权和包养，是这些人效忠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唯一理由。它们自从上了这条贼船，就再也无法脱身，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希望垮台的那天，自己和家人已经吃够了油水，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不要幻想可以和它们辩论！不要以为它们会对革命者有半点同情！不要期待它们会被你的真诚打动！我们与此类特务机关，只能是你死我活——现在它们迫害革命者，明日所犯下的暴行必会被加倍返还给旧政权的走狗们，活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都是对此类人渣的怜悯。革命者必须清楚，自己面临的敌人是多么无底线和不择手段。

四、专挑“软肋”下手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特务机关首先会掌握革命者的家庭情况、社会情况以及关系网。（这对承担情报职能的“国安”机关唾手可得）因此，特务机关就会根据自己手里掌握的被审讯者的信息“看人下菜”。

针对青年革命者，特务机关会抓住“学业”重拳出击，首先它们必然讲“一旦你不配合我们的行动你的学业将会到此为止”。实际效果上这并没有多么恐怖，除非青年们觉得自己读完大学去送外卖比现在送外卖更舒适。但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和宣传机器的共同发力下，很多青年学生的心理防线就会彻底垮塌。他们处于一个纠结的阶段，又清楚自己不爱上学、这个学也没有任何意义，不是真正教书育人而是考分游戏；又因为家人的期待、社会上的目光和对未来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去遵从他们的规划。

很多学生——在已知的案例里——在此等威胁后很轻易地配合了它们的行动。他们这样决定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一旦学生染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学校领导不管是出于爱惜自己羽毛的考虑或者是其他种种原因，绝对是不敢再招收这些学生入学。除非家里有权、有关系，否则不管所谓成绩有多么优异，参与严肃的政治活动被捕的学生的学业都会被打击。

“父母”同样是革命者的一大“软肋”，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子女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孝顺”情绪，因此国安特务机关就会抓住这一点，以家人的安全和工作来威胁。他们之所以不用个人的工作施压，是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无论如何他们也清楚自己被捕后饭碗是要丢掉的。成年人与其担心自己的收入，更多时候是陷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牵制中。

面对这样的情况，同志必须要清楚：国安特务机构之所以煞费苦心来威胁要剥夺革命者“所在意的”，就是为了让革命者讲出对他们有用的相关信息，或者从精神层

面进行彻底的“斩杀”，让人沦为行尸走肉。我们能如何避免被这种施压手段打垮？那就必须在它们施压之前，已经有放弃这些的觉悟。事实很残酷，统治阶级不可能给革命者留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条康庄大道，既然想要成事，我们就必须具有不逊于老一辈革命家的魄力和勇气。

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东西。难道我们要蠢到祈求它们不用这种对中共百利而无一害的战术胁迫自己？当代革命者需要从旧日的幻想里清醒过来。衡量自己参与政治的初心，去对自己加以更高的要求，每个人都有机会理解这点：

我们没有什么更多“失去”的了，除了套在身上的锁链。

五、避免“正常化心理”

首先，我们需要给同志们解释何为“正常化心理”。它指的是在生活出现巨大变故后，人们一种消极的自我安慰手段。它尝试将不寻常的、明显的危险的信号，用一些莫名其妙、异想天开的思路解释为“一切都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它是把事情往好的想，哪怕现实都站不住脚。出于自己无法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便尝试在脑海中而不是作出实际行动拯救自己。在当下的革命队伍中，我们看到的诸多案例，因为“正常化心理”的作祟耽误了时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共产主义者应该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无法再改变。任何人都无法逆转时光，这时候后面的许多所谓“补救”，无非是给自己一个暗示，而不是真正地能起到什么效果。我们要有效机动、避免灾难真正降临，那只有一个方法：先面对现实！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我们如何懊恼，事实也板上钉钉。不该把事情“往好的想”，这种赌博一般的战术只会让自己遭殃，理性的人只能按照最坏方案提前做好准备、留下底牌。

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很多时候，现实根本不是“没得选择”，而是革命者自己不断地在内心降低威胁进行自我安慰，让人如同失明一样看不到其他选项。每个人肯定都不希望失去一些东西，但作为人的自由、生命和继续参与政治的能力相比于那些次要的东西，到底革命者更渴望什么？不要到了最后一刻再后悔当初的固执。

说白了，当已经接收到了危险的信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看看腿是长在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用最后的机会放手一搏。我们在已知的案例里观测到，很多中国革命者在被逮捕前甚至得到了通知，但因为正常化心理的限制，他们采取了“鸵鸟”的战术，一手允许了悲剧的发生。

毕竟，谁都可以在心理上“正常化”风险，但在现实中如何规避风险，则需要我们谨慎判断。

六、一些“普法”

在一篇文章里，《共产主义者》如此说：

“很多时候，左圈里泛滥的网左不是警察没有发现，而是警察不觉得搭理他们有什么必要。政府让他们在一些地方隐喻、讽刺不是不懂，而是这没有威胁。这些人吹水对维稳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正如前文所说，我们不担心吓走某些人，他们跑掉只是时间问题。真正有骨气的，哪怕现在退缩，现实是最好的政治教育课，在未来他们也将被组织起来。我们想争取的是真正希望用实践作出改变的革命者。

共产主义队伍中，轻浮的、闹着玩的、玩耍的气氛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当多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们还不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们不想通过煽动让任何人一时兴起参与革命，我们不想和“东突”分子一样欺骗一些无辜的群众，我们说是时候泼一盆冷水，提醒下同志们我们面临的是什么了。以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章节选：

“第一百零四条 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零五条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本章上述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中，除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外，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还有一点补充：实际执行中，对于国安等特务机关，它们甚至都无需遵循上述法律——哪怕是未成年人也没用。同志们，我们承担此等光荣使命的同时，必然是承担着绝非凡人能接受的风险的。必须治疗队伍的幼稚病，真正的革命党才能被建立起来。最后，我们引用一句话：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从“七五”事件看新疆族群矛盾问题

作者：王直

由于长期的灌输，诸多共产主义者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依然残留着统治阶级强势宣传的烙印，这使得许多人面对被主流舆论封锁的事实时，表现出一种令人诧异的盲从。例如，由于长达数十年的信息真空，不少人竟将“六四”视为自由派的“文学杜撰”，完全忽视了那场运动背后深层的阶级矛盾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同样在新疆问题上，这种追随官方口径的倾向更为普遍。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新疆的民族矛盾似乎只是一群恐怖分子在搞分离主义而官僚机器则是护民众安全的唯一救星。对于“七五”事件，在现有的任何公开渠道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的、剥离了民族偏见的分析。人们能看到七五事件中两族持刀互砍的视频，却从未了解这场悲剧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底层各民族劳动群众因何彼此残害。

如果没有对历史伤疤进行解剖的勇气、如果我们依然满足于从官方通稿里拾人牙慧，那所谓的“革命立场”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薄纸。革命者不应仅仅接受事实，更应挖掘真相。

民族仇杀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维吾尔人和汉人劳动者集体斗殴事件，造成了两名维吾尔女工死亡。这起原本由于工厂内部矛盾和民间误解引发的治安纠纷，在信息的断层与扭曲中成为了引燃后续不幸的导火索。

当调查进展在官方渠道中缺位时，信息的真空便迅速被政治投机者占领。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表现出了远超中国政府的政治敏锐度。他们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大量散布虚假信息，指令国内“线人”大肆夸大伤亡情况，通过将两人的死亡扭曲为“大规模屠杀”，成功地在积愤已久民族情绪的干柴上投下了第一颗火星。为了制造视觉冲击，他们甚至挪用来无关的交通事故现场或异地冲突照片移花接木。这些谎言通过当时的维吾尔语网络空间（如库克论坛等）迅速扩散，“东突”组织公开号召境内人员在7月5日“上街闹事”，用底层鲜血换取自己的政治筹码。

7月5日，大量境内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恐怖组织成员及受煽动的群众开始在乌鲁木齐大规模上街集会。原本的和平集会在18时40分发生质变：人群的情绪在极端口号的刺激下被推向失控，开始挑衅维持秩序的民警，并推翻、焚烧警车。20时左右，由于警方封锁了人民广场等核心区域，部分人转移到二道桥、大巴扎、团结路、延安路等巷道密集、地形复杂且人口结构集中的老城区。当晚原本的肢体冲突演变为血腥的暴力仇杀，“东伊运”骨干分子煽动游行的维吾尔群众对街头的汉人无辜群众进行屠杀。大量无辜市民在公交车、商店和街道上遭到惨绝人寰的袭击。当日深夜，官方随即实施交通管制和通讯管制，武警部队大规模进驻并控制城市主要干道，局势才在血泊中暂时得到控制。

7月6日，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汉人群众因为前一晚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和惨重的亲友伤亡，加上当时乌鲁木齐警方极其有限的人手在混乱的局势下难以有效保护，愤怒与恐惧的情绪达到临界点并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他们手持棍棒、铁锹、利刃等自卫工具上街报复，局势一度演变为不同群体之间在街头的直接对峙。至此，整个事件彻底演变为一场波及全城的文化与宗教仇杀，原本脆弱的群众关系在这一刻降至冰点。

7月中下旬，全国各地警察受命紧急赶到乌鲁木齐驰援以稳定社会秩序。7月13日，在局势依然高度紧张且零星冲突不断的背景下，沈阳援疆警方在乌鲁木齐友好路开枪打死已经放下武器的维吾尔人七五事件参与者。至此，这场事件的镇压力度已经明显超过了“反恐”的正常法律限度，同时也标志着新疆后续十多年高压维稳政策的开始。

为了彻底隔离新疆与境外组织的联系以及信息传播，新疆经历了长达10个月的互联网中断（直至2010年5月才全面恢复，但仍然处于高强度监控之中）。2009年7月中下旬商业活动逐步恢复，但从此之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安保级别（如公共场所强制安检、街道常态化巡逻）进入了常态化的高压水平。2010年4月，张春贤接替王乐泉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开启了所谓“柔性治疆”阶段。2010年5月，中央召开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举全国之力启动了“十九省市对口援疆”，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民生工程、教育投入和产业扶持，从根源上消除社会动荡的物质基础。

这场事件被中共官方定义为“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乍一看这个定性，不少人都会觉得中共的定性是正确的，的确暴恐分子在乌鲁木齐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那么，如果我们放下“种族本性”和“宗教狂热”的偏见，理性客观地分析这一场改变新疆社会的“惨案”，这一场运动投射出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暴恐”事件那么简单。

“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民族本性”？

如果七五被认为是一场简单由“宗教狂热”引起的所谓“圣战”，那么“宗教战争”为什么没有在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更加浓厚的南疆甚至曾经爆发“三区东突厥斯坦运动”的边境地区爆发？如果真的要策划“维吾尔人的伊斯兰圣战”，为什么不在所谓“圣战”土壤最丰饶、维吾尔人穆斯林占比相对较高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

地区起头？

之所以惨剧发生在乌鲁木齐，是因为相比于“宗教信仰”，它更深层的成因是新疆地区长久存在、愈发恶化的族群间矛盾。乌鲁木齐没有“圣战”的土壤，却是发起族群仇杀的绝对优势地区。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市是当年汉人、汉回民等说汉语人口最多、但在人口比例上不占绝对压倒优势的城市，相比于克拉玛依、石河子这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手建立起来的城市，汉人和汉回民人口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反倒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汉人人口比例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维吾尔人口占比百分之十三。同时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各种媒体机构、企业、政府机关都驻扎在此，因此事件在乌鲁木齐爆发更加具有影响力。

将民族矛盾片面总结为宗教信仰导致的“习性”，恰好是当下以色列当局屠杀加沙群众使用的借口。我们不能只看“七五”当天“东伊运”骨干分子对汉人群众犯下的罪行就将问题归咎于维吾尔人的“嗜血”，而是要问，维人群众的愤怒情绪从何而来？

内塔尼亚胡通过炒作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平民的新闻，将自己塑造为弱势、被欺负、被镇压的一方。但我们说，历史不始于十月七日，“锡安主义实体”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各族人民犯下的长达几十年的暴行不会被忘记。对殖民者的仇恨是他们咎由自取。同样，北京政府几十年来对新疆执行的不平等政策才让族群仇杀有了土壤。历史不始于七月五日！

但凡在新疆生活过、当面接触过维吾尔人普通群众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大部分底层人的朴素与善良。历史上来看，维吾尔人也长期同汉人在西域混居，产生了十分灿烂的独特文化、艺术与宗教传统——一些民族主义者把清代在俄英帝国主义煽动下汉回民发动的“陕甘叛乱”同维吾尔穆斯林混为一谈是纯粹的胡诌八扯、混淆视听。我们不能忘记，尽管维吾尔人作为中华人民各个成员族群中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形成于各迁入民族混血于塔里木地区绿洲诞生的农业垦荒者先民。只有在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与中共的歧视性宣传下，他们才被强行抹黑为“圣战恐怖分子”一样的形象。

北京政府的官僚机关在边疆地区推行的并非真正的民族平等，也没有给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群众任何自治的权利，而是执行着一种带有殖民色彩的行政高压。首先，所谓的“维吾尔自治区”建立本就是十分可笑的：新疆在1950年代有三成以上的汉人民众，四成左右的维吾尔人群众，以及剩余的诸多中亚民族（尤其是哈萨克人）群众。在中华民国的盛世才新疆军阀时期，大量回民、哈萨克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地方军阀的军队中服役，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族群混居的历史事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本质上是当时中共的权宜之计：由苏联支持的阿合买提江等维吾尔、乌兹别克和突厥人民族势力投靠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打起所谓的“三区共产主义革命”旗帜，实际上则是希望通过建立斯大林式的“纯粹东突厥民族国家”清洗其他民族、用种族仇杀的方式把新疆永久地从中国乃至东亚的地理范围中分割出去。由于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的应对措施，这一主张没有成功，阿合买提江等人也摇身一变、从机会主义屠夫变成了新政协与新人的座上宾。为了“统战”这群嗜血的屠夫与斯大林的棋子，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必

须建立起一个“维吾尔人的自治区”取悦他们与他们背后的莫斯科苏俄干涉主义力量。在那之后，新疆也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族群和谐与自治，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自由甚至还不如盛世才时期。当文化被边缘化、族群的语言被排斥，这种系统性的歧视必然会转化为底层民众深层的不满。中共现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最远可以追溯到王震进新疆时期，当时王震担任新疆第一书记和新疆军区总司令，开展的所谓镇反和剿匪政策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后来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针对维吾尔与其他非汉语族群的屠杀。由于王震的高压政策极大地激化了族群矛盾，后来王震被毛泽东召回北京，由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政新疆。至今由于王震那些年的血腥统治，在部分维吾尔人群众中甚至用“王震来了”来吓唬小孩。

在“七五事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维吾尔群众如果要去内地甚至都需要办理所谓“便民联系卡”，俗称的“出疆证”，其要求必须拥有初中学历；2023年前维吾尔群众的护照被公安机关“统一保管”事实上被禁止出国，后来当局民族政策调整后，维人如果不是通过旅行团的方式或者去做贸易，仍然无法出国。他们前往土耳其等国家后回国面临的就是一年起步的监禁——就算是合法前往土耳其之外的其他国家，他们旅游归国后仍然面临护照收缴与持续骚扰。至今，不论族群，凡是新疆户口办理护照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新疆户口办理护照要求国际旅行社出具的“国际旅行发票”）；新疆警方对于维吾尔人与汉人和汉回民的执法力度和手段也完全不同。比如有些地区，汉人可以去但维吾尔人不可以去；汉人和汉回民享有很高宗教自由，但维族人却没有（除非是被中共当局控制的宗教组织）；中共甚至在大荒漠里开设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它实际上就是现代的集中营，用来关押异见者，在其中使用强迫劳动、洗脑和野蛮的暴力实行恐吓。

这样的例子不甚其数。新疆群众的愤怒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无知”导致的，而是在缺乏其他替代出路的情况下，族群矛盾被野心家有目的地煽动，最后导致了对各个族群民众都百害而无一利的死局。

出路何在？

中国政府的“解法”，是在高压管控的同时，通过发展经济和民生，拿稀粥喂饱新疆的老百姓。但新疆各族群人民大众生活真的变好了吗？

所谓的“开发边疆”，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对当地资源的野蛮掠夺。在这个过程中，利益被资方瓜分，而由此产生的环境代价和社会成本却由当地劳动群众承担。比如说路人皆知的“新疆棉”，而独立的棉花种植户却面临着棉花收购价格低、原本的种植用地和农业用地被政府、兵团与大企业强征。所谓的对口援疆也只是为资本进行商品倾销以及转移在其他省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下日益难以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披上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毕竟，由于长期的剥削压迫，新疆地区的劳动力价格要低廉很多，也更容易受压迫。

习近平特别喜欢坐着大巴或轿车、踩着红毯，一颠一颠地跑到少民或落后地区“视察”，希望以此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被安排好的“欢呼”和“迎接”很多时候让我们质疑自己是否生活在北朝鲜——反乌托邦甚至都不需要去从书里找，我们

只需要看习近平这些莫名其妙的出行就可以。官方宣传里，我们肯定只能看到所谓“维吾尔百姓热烈欢迎总书记”。之前，他们还叫嚣在二零二零年“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在哪？现在自己也都知趣很少提了。信息封锁很多时候让内地无法了解到新疆维吾尔族真正底层的生活条件，事实上它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最落后的农村还要贫穷。至今，很多新疆群众，无论民族，还只是住着土房。



谷歌地图上的新疆某处街景，可以看到面向街道的一侧为砖瓦但是内部仍然是土房



新疆某处街景实拍，有些住房仍然有人居住

到了今天，虽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反恐态势下新疆的恐怖袭击的确已经销声匿迹，但维吾尔人正在遭到中共当局史无前例的迫害。大量的维吾尔群众仅仅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做了有关伊斯兰教的动作、甚至只是持有《古兰经》就被当局以“反恐”的名义送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几年甚至数十年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家

人。这样的情况也困扰着许多其他新疆的少数民族群，虽然他们受到的压迫要稍微轻一些。族群矛盾从根本上就没有消失，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仍然在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如就业歧视、居住差异）。在现实情况中，在新疆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重体力劳动的都是维吾尔人群众。目前新疆的和平稳定，不过是因为中共极端的镇压方式在表面上得以维持。

族群矛盾如果只是站在两个不同族群的暴力、对立立场思考，那只能是更多流血。正如性别问题一样，如果只是男女彼此仇视，那我们不同身份的人之间除了憎恨还能有什么结果？从客观上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压迫和被压迫关系出发，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团结起来、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的出路。

现实是，不同族群人民、尤其是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利益毫不冲突！维、汉群众信仰什么宗教、跟随什么文化习俗、想说什么语言都是出于他们作为人的自由而、与“身份”无关。汉、维劳动者没有意义压迫彼此。我们同为统治阶级的奴隶，只有被压迫而达不到压迫别人的“门槛”或“能力”。实际的俄英殖民者与现在的北京政府如出一辙，在地图上染色，不会给底层劳动者带来任何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鲜明地指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族群矛盾正如其他社会冲突一样，是阶级矛盾与经济利益在文化、宗教族群和种族等问题上的投射。正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常年对全体新疆人民的剥削，再加上新疆自身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经济很难取得卓越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疆的少数群众在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很自然地便认为是作为当今中国主体族群的汉人充当了压迫的来源与压迫者，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疆不仅会发生七五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冲突。

只靠那在街头喊一喊“解放维吾尔”真的能够自由了吗？答案是根本不会。只要剥削制度存在，族群、教派等等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届时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只会接踵而至，七五事件这一场造成197人死亡1727人受伤的惨案必将再次重演。只有维吾尔群众站出来自己解放自己，将新疆的革命融入到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革命之中，才能够真正获取平等、自由。

我们语言不通、身份不同的阶级兄弟必须跨越天山、直抵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团结起华南华北平原丘陵的劳动者，反击统治阶级一手营造的敌对情绪，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为推翻北京反动政府这个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斗争！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如何安全地联系我们

确认发信邮件地址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联络邮箱为：Leninists1917@proton.me 且在组织的所有宣传材料和频道上都有标注。除非组织进行了邮箱调换，请不要联系该邮箱以外的任何邮箱。

注册 Proton 或任何加密邮箱服务

注册一个 Proton (<https://proton.me/>) 等平台的安全邮箱且确保不要使用常用的密码或能够识别至个人的信息（如生日、个人真名或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邮箱地址）。千万不要使用 163、QQ 等国内邮箱平台，且尽量也不要使用 Gmail 等非安全邮箱。

使用 VPN

在与我们联系时时刻记得开启 VPN，具体指南见[组织安全手册的节选部分](#)。

发信并注明来意

请各位同志在发信时阐明自己的需求，无论是想要加入组织、分享信息还是投稿文章都请清楚说明。

等待回信

组织的联络负责人们会尽快与各位同志取得联系。在此过程中，请务必将联络事宜进行保密，不要与任何不相干的人做任何分享。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